

## 根据什么指标來判断圖書館工作

伊·察列格拉德斯基

應該按照怎样的指标判断國內、省內、市內和區內圖書館事業的水平和狀況，即是如評價每一个別圖書館工作的質量，是每个圖書館員感到热烈兴趣的問題。

這是必然的，第一，因為近幾年來沒有發表過表明國家圖書館事業狀況的材料，第二，因為現時有些人評價圖書館工作所採用的指标，我們深信那不是決定性的，同時只会把圖書館員引入迷途。

當然，圖書館的思想教育工作，只靠數字是難以衡量和評定的。圖書館工作的內容和質量首先取決于它借給讀者一些什麼圖書，如何幫助讀者選擇書籍以及指導他們的閱讀，它把自己的活動與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聯繫的程度如何。單純追求数字指标有害于對讀者認真深入的工作，導致形式主義。

但是，有些數字指标，無疑是反映了圖書館工作的規模、方針，羣眾性和水平的。

那麼這些指标是什么呢？

弗·伊·列寧在他精辟的論述中擬定了用以判斷國家圖書館事業的狀況和圖書館活動的基本指标。這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以圖書館的主要職能在羣眾中廣泛宣傳圖書為出發點的。大家知道，在“能為國民教育做些什麼”一文中，列寧強調指出應該“認定圖書館的驕傲和光榮不在于它藏有多少珍本，多少十六世紀的版本或十世紀的手稿，而在于圖書在人民中間流通得多廣，吸收了多少新的讀者，對於圖書的各種要求滿足得多快，有多少書籍外借，有多少兒童被吸引來閱讀和使用圖書館”（列寧全集十九卷247頁）。

列寧認為出借圖書數量是重要指标之一。他寫道“教育事業安排得合理與否，應根據出借圖書數和給與大多數居民以怎樣的便利來衡量”（同上248頁）。就在这篇論文中，列寧分析了紐約大眾圖書館的工作報告：1911年它在住有三百万居民的，紐約市三個區里——曼哈頓，布朗克斯和布希維克設有四十二所分館。在1911年出借圖書7,914,882冊。因此列寧作出結論說“每百個居民（不分年齡性別）平均一年借出圖書267冊”（同上248頁）。

大眾圖書館按居民人口出借的平均圖書數量，是圖書館事業的非常明顯的令人信服的指标。

可惜我們沒有關於一切主管機關和團體的大眾圖書館的借書數字與讀者數字的總括材料。俄羅斯聯邦國立大眾圖書館1955年借出了4,542,000,000冊書，大約每個居民4.1冊，1954年是3.8冊。這個數字還應加上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工會圖書館對每人的借書1.8冊。因此俄羅斯聯邦每人一般借書數約為5.9冊（不算集體農莊的、黨和其他大眾圖書館的）。

但如果拿個別的省和邊區來看，情形是形形色色的。在斯達夫諾波爾斯克邊區國立大眾圖書館按居民人口借書平均數是4.6冊時，克拉斯諾頓邊區只借出3.3冊。在華爾曼斯克省2.5冊，伯力邊區2.9冊這個指標就更低。

可見，在增加圖書館的出借圖書數方面，在改善對居民的圖書供應方面還面臨着巨大的工作。

這首先要通過增加圖書館讀者人數來完成。在1928年俄羅斯聯邦一切主管部門的各大眾圖書館為全部居民的5.4%服務。俄羅斯聯邦國立大眾圖書館的讀者人數不斷地增長，僅在1955年就增加了2,105,000人達到24,754,000人，佔全部居民22.3%。這個數字應加上9,289,000個工會圖書館的讀者。這樣，俄羅斯聯邦文化部和工會圖書館擁有約佔聯邦居民30%的讀者。

當然，利用大眾圖書館的居民的百分率能更加提高一些。例如在高爾基市維特魯日區由於對所有居民點的書籍供應工作組織得好，全區居民有38.5%成為圖書館的讀者。

在1955年，古比雪夫省(32%)和土拉省(30%)國立大眾圖書館在居民中的讀者達到最高範圍，自然在這些省出借給每個居民的圖書數也是較高的。但在庫爾茨克省國立大眾圖書館的讀者佔居民的20%，伯力邊區17%，華爾曼斯克省12.3%。進一步吸引新的居民層到讀者中來仍然是所有圖書館的迫切任務。為了解決這一任務，需要進行巨大的圖書館和文化部各機關的組織工作。大量圖書館

(特别是在农村)只有极少的读者，而且不采取任何办法吸引居民来读书，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

必须牢记这一点：列宁认为使图书馆员掌握关于吸收新读者阶层、妇女、儿童等的确切材料是必要的。

下列指标并非不重要的——居民的图书保证率，即图书馆藏书总数与全部居民人数的比例。这里我们所感到兴趣的是大众图书馆网保证居民图书的程度如何。恩·克·克鲁普斯卡娅特别关心提高居民图书保证率。“如果我们拿各个区的图书馆的书籍数量和识字居民人数作个比较，就可看出图书馆数量和识字居民人数之间存在着鲜明的联系”娜吉士塔·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书籍的贫乏”一文中这样写。同时引用了下列1926年的材料：

	每一百个居民	
	图书数	识字人口数
中央黑土区	9.9	35.0
北高加索	14.0	38.0
伏尔加河下游	16.0	38.5
西北区	23.0	48.0
东北区	43.0	44.0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在1926年无论哪一个区一个居民甚至也合不到半本书。

1928年，克鲁普斯卡娅在给本文作者的信中强调指出：“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那样一些地区，使那兒共同使用一冊書的人數的指標超過5冊”（着重点是克鲁普斯卡娅加的）。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大力注意补充图书馆的藏书，从上面引用恩·克·克鲁普斯卡娅的表中可以看到30年前在我国图书保证率是由平均一册图书馆书籍的居民人数来规定的，相反的，现在我们则是以平均每个居民可用的国内大众图书馆多少册书来计算的。

1956年1月1日苏联大众图书馆拥有图书590,000,000册，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是344,000,000册。根据苏联文化部1955年的材料，大众图书馆的图书保证率为：苏联每个居民2.9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3.3册，而1954年为2.8册。

但就是这个图书保证率也已经不能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应该考虑到不同的省、边区与自治共和国在图书保证率上的不平衡和在某些情况下的贫乏。特别是对农村居民，图书的保证率极不

平衡：俄罗斯联邦的30个省、边区和阿美尼亞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每一个农村居民有1—2册图书馆的图书，有28个是0.5—1册，而在依尔库次克、克缅诺夫、新西伯利亚等省只有0.5册。

进一步以书籍充实图书馆（特别是农村图书馆），这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大众图书馆的物质基础的指示中所决定的全国的重要任务。我们认为要使图书馆服务事业巨大增长，在俄罗斯联邦农村图书馆中每人应不少于3册图书。

1957年，有许多省和边区（西伯利亚、远东、荒地开垦区）的村立图书馆的图书经费有了一些增加——追加了一千万卢布。还应该更广泛地吸收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资金来补充图书馆的新书。

进一步加强图书馆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改善图书馆藏书的利用。平均每年图书流通指标不高也就说明许多图书馆工作不好。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屡次注意。

当然，在各个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里，图书流通率不可能是一律的，它是随着藏书的选择和总数，随着读者的数量和成为转移的。但每个图书馆可以有它最高的流通率，它可说明怎样积极地利用该馆的全部藏书。可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各类大众图书馆最近几年的图书流通率都降低了，这是不能原谅的。

这从下列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文化部的材料中可以看出：

图书馆型类	每年平均流通率		
	1950年	1954年	1955年
省	1.9	1	1
市	4.4	3.6	3.2
区	3.3	2.6	2.1
村	2.7	1.9	1.5
儿童	5.9	4	3

这些数字说明许多图书馆不能令人满意地回答列宁所提出的問題：“你能够用确切的材料证明你们图书馆图书流通率的增长吗？”

常有人藉口，好象图书流通率指标的降低是由于近几年来藏书量大大增长所造成。但是这里有1955年几个先进农村图书馆工作的有趣材料：列宁格勒省罗斯捷斯特夫村图书馆每年图书平均流通率是3.3，莫斯科省莫涅夫尼柯夫斯基村图书馆是3.5，同时，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村图书馆图书平均流

通率仅只 1.5，实际上那些先进图书馆的书籍补充比其他的馆更要紧张些。由此可見就在这样大量补充书籍的情况下先进图书馆的图书流通率也在增长着，我們能够举出很多的这样例子。

当然，低下的图书流通率在一定程度上由图书馆藏书成分决定的。应该指出，在图书馆里有许多陈旧的多余的没有价值的出版物。图书馆常常不正确地补充那些不为读者所需要的书籍。不过这只是图书馆流通率不大的原因之一。主要問題在于許多图书馆員是接触范围極狭的书籍，不大知道藏书的成分，把自己的图书馆財富揭露在读者面前做得不好，许多图书馆沒有目录，沒有充分地布置直观的图书馆宣传工作。

为了执行苏联文化部的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图书流通率（1956年6月29日424号命令），所有图书馆工作者和图书馆事業的领导者付出了不少劳动。

那么，这應該作些什么？

第一，要仔細地研究藏书，把它安排得有秩序，把它从那些多余的，陈旧的对本图书馆不适合的书籍中解放出来。

第二，慎重地认真地处理图书馆补充，正确地确定购书的复本。那些很少为读者所询问的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得到书籍就不要去买。

第三，通过目录、卡片、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宣传画等更加广泛地揭露藏书财富。

第四，（特别重要的一点）积极地在读者中宣传图书馆，要善于在借书时介绍书籍。对读者有价值有趣味的为读者所需要的书籍搁置不动的这种情况是应结束的时候了。

对农村图书馆要进行特别巨大的工作来提高其藏书流通率。应当面向真理，公开承认农村图书馆在补充和利用图书馆财富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致使图书馆流通率如此之低。

每年阅读率（即平均每个读者一年中阅读的书籍数）也是图书馆活动的最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有着巨大的增长。根据叶·恩·米登斯基的报告，在4,250个农村和大众图书馆中1912—1915年，平均每个读者一年借用8.4册，而1955年在国立大众图书馆平均每读者读过18.2册。这不仅表明图书馆对读者工作的巨大改进，同时更重要的是表明了人民文化的巨大增长。

弗·伊·列宁强调指出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训练居民利用书籍。在“论合作制”一文中，他写道：“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知識程度，没有充分教导居民去阅读书报，以及没有做到这一切的物质基础，没有例如防荒防飢等等的相当保障——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們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全集33卷430页）。

下面引用的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农村图书馆阅读率的增长特别大。

省	1910年大众图书馆和村图书馆	1955年国立农村图书馆平均阅读率
	平均阅读率	(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材料)
	沃罗戈德	9.0
洛夫戈罗德	7.1	12.6
萨拉托夫	6.0	16.9
加里宁(特维尔斯基)	8.7	15.5

这里应该考虑到革命前利用村图书馆的只是极小部分富人，主要是富农、识字较多的居民、少数乡村教师等等。现在，千百万集体农庄男女庄员们乃是村图书馆的读者，书籍和阅读，对于他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达到的。

当然，这些数字并没有给予我们自安自慰的数据。分析近几年的材料，可以看到阅读率有些下降，虽然不很显著，这也可从表中看出：

图书馆类型	阅读率	
	1950年	1955年
市立	23.2	22.5
区立	18.4	17.4
村立	15.3	13.8

有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当读者的文化水平和精神上的需要巨大增长时，每年平均阅读率却减少了。这多少由于近几年来许多劳动者有了私人图书馆，但主要原因决不在这里。在吸引读者方面我们还有不少的形式主义。图书馆吸引了新的读者，却不关心去巩固他们，不注意去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看到，在哪里读者受到重视，哪里关怀他们，哪里就有很高的阅读率。如果1955年俄罗斯联邦村立图书馆的平均阅读率是13.8，则米哈依尔村立图书馆达到了21，莫涅夫尼哥夫斯基——17而

罗日捷斯特夫——36，这些图书馆之所以获得那样的成就是因为广泛地宣传图书，对每个读者都注意的态度，如果罗日捷斯特夫或莫涅夫尼哥夫斯基的读者长时不来馆，图书馆员就要查明如何发生这事。而阿尔汉格尔斯省梁沃涉里斯基村图书馆十个读者半年没来借书没有任何人注意这事，虽然他们都居住在同一的不很大的村子里。

因此为了提高平均阅读率，需要进行顽强细致的工作，首先是分别对待每一个别的读者，经常注意那些不经常到图书馆的读者。

在判断图书馆工作的质量时，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是以如何规模地积极宣传那能帮助读者学习马列主义，解释党的政策、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国际问题等等的社会政治书籍。使人在图书馆较多读到技术的农业的书籍，这也是重要的。

1956年上半年，阿尔汉格尔斯省拉姆波惹村图书馆出借政治书籍只占全部出借书籍的0.4%，农业书籍0.5%。这个数字难道不足以明显地证明这个村图书馆工作水平之低下吗？难道这不是说明了拉姆波惹图书馆离开了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具体任务吗？特别是当全苏人民在学习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的时候，当各地对农业技术书籍的需要显著地提高的时候，这样微不足道的成果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在莫斯科省、土拉省、雅罗斯拉夫省的一系列图书馆中，1953、1954和1955年期间，社会政治书籍的出借减少了，而图书馆以及文化部门的领导者都忽略了这种现象，没有分析这些指标，没有注意图书馆工作的内容。

至于技术和农业书籍出借的情形怎样呢？在规定苏联技术发展任务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之后，计划大力提高技术知识的宣传工作。俄罗斯联邦市立图书馆生产书籍的出借达5.6%，但工业发达的在车里雅宾斯克省的图书馆这种指标降低到4.8%。车里雅宾斯克省图书馆工作者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帮助集体农庄执行党对农业的决议时，图书馆积极地展开了农业技术书籍的宣传。1955年这一类书籍出借占6.4%而村立图书馆占全部出借书籍的7.3%。奥尔洛夫省、土拉省、巴什基里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个指标达到10%，沃龙涅什——9.8%。参加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图书馆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洛日捷斯特文图书馆农业书籍出借

率18%，米哈依洛夫——19.5%，在这些成绩面前，难道能够漠不关心地对待像克拉斯诺顿边区农业书籍出借率5.8%，伯力边区只有2.1%这样的事实吗？

有人认为按不同知识部门区分图书馆出借率是形式主义的材料，并轻蔑地称呼按这种指标评定图书馆工作的为“百分迷”。不错，无论哪种数字都不能彻底揭露图书馆关于此类书籍的工作的效果。但无论某种知识部门图书馆出借总数或这一总数对全部借出的比例都可说明了图书馆工作的方向和它所取得的成绩。

按人口的出借图书数，图书保证律，图书馆所收居民数，藏书流通率，阅读率，政治的和科学的书籍出借数——这一切指标都直接证明图书馆如何执行的一项主要任务——即把书籍推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在这些指标之中，基本上是有关书籍的工作，这也反映着图书馆事业的一个特点。

然而最近有人坚决地提出一个图书馆出借的费用作为图书馆工作的基本指标。并且把图书馆全年经费减去基本建设除以同一时期内图书馆出借次数，照这样计算，1955年俄罗斯联邦农村图书馆的出借费用是1卢布90戈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1卢布61戈比，白俄罗斯——3卢布19戈比，哈萨克斯坦——3卢布73戈比，土库曼——7卢布57戈比。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指标实际上是说明什么。原来是说，在其他各种相等的条件下，图书馆经费和图书馆购置的次数愈少，每一次出借图书的费用就愈便宜，只用一项图书馆借出就够了，例如阿尔查马斯基省市立图书馆1955年每次图书馆出借费用是85戈比，格洛兹涅斯基省87戈比，加里宁城1卢布30戈比，卡缅斯基1卢布60戈比，如果照每本图书馆出借费用评判，就是前面两个省图书馆的工作最好，事实上，阿尔查马斯基省市立图书馆购置图书的款项平均为11,400卢布，格洛兹涅斯基10,500卢布，卡缅斯基17,600卢布，加里宁城18,000卢布。由于阿尔查马斯基和格洛兹涅斯基图书馆的图书馆保障率差一些，所以每册图书馆出借费用低一些。

我们再分析莫斯科市附近的两个图书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契诃夫图书馆的材料，前者在1955年每本图书馆出借花费74.5戈比，后者是69戈比。可是它们的其他工作指标是怎样的呢？

圖書館名稱	每次圖書出借費用	每個圖書館工作者的讀者數	圖流通率	社會政治書籍出借的%	技術書籍出借的%
奧斯特洛夫斯基圖書館	74.5 戈比	950	4.5	24.5	5.8
契可夫圖書館	69 戈比	908	2.9	7.8	4.9

這些數字十分明顯地証實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圖書館的工作水平和質量高於契可夫圖書館，雖然後者的圖書出借費用較低。

還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在計算現金費用時，忽略了有著重大意義的有關書籍的羣眾性的文教工作呢？要知道奧斯特洛夫斯基圖書館在1955年曾經組織過四次讀者代表會，十一次講演會，七十三次圖書評介，二百一十七次圖書展覽會。俄羅斯聯邦文化部大眾圖書館1955年舉行了111,700次讀者代表會和圖書評介，349,000次圖書評介，500,000次有名的講座。在規定圖書出借費用的時候並沒有計算這一整個非常需要的工作。

其次，將圖書購置裝訂費、編目費、設備費等完全包括在當年的圖書出借費用中是非常錯誤的。實際上這些經費所購置和製造的東西能用好幾年，為什麼將購置圖書的費用分配在僅是一年的圖書出借數上呢？要知道作為國家文化財產的最寶貴的藏書是圖書館長期不斷地補充和收藏起來的。顯然，這樣計算一次圖書出借費用的方法是毫無根據的。

最後有這樣的問題：各蘇維埃機關和圖書館員為了降低一次圖書出借費用而鬥爭應做出怎樣的結論？

大家知道，每個產品價值的降低，一方面是縮減雜費、行政費用和其他開支，一方面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是在生產過程中的機械化與自動化。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蘇維埃機關有根據地增加圖書館的圖書購置和設備費的撥款因之使得圖書出借費用增高，它們究竟怎樣辦呢？

不，把單純數學的計算圖書出借費用放在改善圖書館事業的首要地位上是不正確的和不必要的，把適用於物質生產範圍，工業農業中一個產品費用

（上接54頁）

爭，在五年內編出圖書館學、目錄學等書五種和論文30篇。師大圖書館要在五年內成立10個科學研究小組寫出60—70篇工作報告和論文。鋼鐵學院要在一年內寫出“中國鋼鐵資料彙編”。農業科學院圖書館要編全國農產錄。北京大學圖書館要用馬列主義觀點徹底批判圖書館工作中脫離政治，脫離教學與科學研究實際，浪費保守、厚古薄今、重西輕

的計算方法搬運在思想工作的領域這是不正確的。

如果也採用關於圖書館工作的一些經濟指標，那就應當像許多國家里所實行的那樣而做出來，就是規定出維持圖書館經費用在一個居民的費用。英國在1954—1955年度是2盧布59戈比，美國在1952—1953年度是3盧布20戈比，丹麥在1954—1955年度是3盧布42戈比。但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僅國立圖書館1955年的經費每人为5盧布95戈比。顯然這個數字還將進一步增加。要知道沒有任何國家像我們國家這樣有著遍佈各地的各種各樣的圖書館網，沒有圖書館這樣大量地包容居民。

圖書館工作者應當頑強不懈地為進一步提高圖書館的基本的，特別是列寧所指出的指標而奮鬥。應該正確地分析這些指標，從中得出改進自己工作的正確結論。

圖書館即將進行1956年——第六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自己工作的總結，應該切實地研究這些材料，在工作會議上加以討論，在每個區市圖書館的會議上和圖書館員訓練班上應該研究和討論圖書館的工作總結，無論進步的或是落後的。

最後，應該每年公佈圖書館事業的基本指標。這種關於圖書館事業狀況的彙報，正如列寧曾經寫的，“應該服務於三個目的：

（1）使蘇維埃政權和全體公民正確而充分地了解現在在做些什麼；

（2）吸引居民親身來參加工作；

（3）發動圖書館工作人員展開競賽……”

正是現在，為了勝利地完成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改善大眾圖書館工作並鞏固其物質基礎的訓令，這一切更加需要了。（王名超譯自蘇聯“圖書館員”1956年第12期，蘇聯華校）

中，重文輕理的資產階級辦館思想，在館中各部豎起馬列主義紅旗，興無灭資，破除清規戒律，學習蘇聯和各先進館的經驗，依靠羣眾，實行技術革命，樹立一切為讀者的館風，爭取在五年或更短的一些時間把圖書館建成一個進步的共產主義類型的圖書館。（展覽會辦公室、北大圖書館學系同學供稿）